

日前，由国务院侨办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华文教育基地承办的2023北京外国语大学“华文教育·华文教师”研习班举办，为来自海外的百名华文教师提供相互交流、深入了解中国发展的机会。

教师们表示，在研习中大家互相分享教育资源，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为前辈对海外华文教育的热情与坚守所感动。



参加研习班的华文教师留影。

张子岳摄

# 百名华文教师共探教学新路

邱煜雯

## 搭建了解中华文化之桥

对于很多在海外的华文教师而言，让学生了解祖（籍）国的发展以及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是教学重点。

孟涵想来加拿大卡尔加里市，学习视觉艺术，并在卡尔加里清华中文学校兼任华文教师。“我教的主要是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的中文读写多是零基础，学习汉字对他们来说挑战较大。”孟涵想说。

“为了激发他们的兴趣，我会将绘

画和汉字结合起来。”孟涵举例说，“例如，在教他们汉字的偏旁部首时，‘水’字旁可以被看作3个小水滴，‘草字头’可以被看作一丛绿草。想让孩子们记下这个汉字，我并不会先问他们怎么写，而是让他们先进行形象联想，这样他们就会对这个字有更加深刻的记忆。”

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欧华汉语语言学校的华文教师张艳用播放纪录片的形式，为孩子们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我会为他们播放《大美中国》等纪录片，当孩子们看到祖（籍）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美景，领略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时，都感叹中国

的美丽和壮阔，期待能够在假期去实地欣赏。”

张艳认为，当华文教师可以从“美”的角度将中国的故事展现在学生的面前，有助于激起他们的情感共鸣。

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杜甫中文学校的华文教师庞鑫听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讲述故宫的故事时，深受触动。“那一刻，我在想，只有激发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才能唤起他们学习中文的热情。就像单院长的讲述让我们对故宫有了不一样的了解一样，华文教师要为孩子们搭建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桥梁。”庞鑫说。

## 创新课堂形式应对挑战

虽然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学生的中文学习兴趣是华文教师的共识，但在开展华文教学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缺乏中文语境、学生学习中文的动力不足等。

张艳认为，华文学校学生学习中文的挑战之一是缺乏中文语境。“当身边说中文的人不多时，学生就不怎么学中文了，他们学习中文的动力并非来自兴趣，更多是家长的要求和推动，这种被动学习难以让他们保持学习中文的热情。”

“学生学习中文的目的之一是学以致用。然而，由于缺少中文运用环境，他们很难在生活中做到学以致用，这就导致其学习动力不足。”张艳以汉字学习为例解释道，汉字学习尤其是汉字书写是学生们公认的学习难点，在教学过程中，汉字较多的读本会增加学生的阅读负担，降低他们的学习兴趣；但反过来，汉字相对较少、内容过于简单的读本又和学生现有思维水平脱节，无法将学到的内容和朋友进行交流。对教师来说，平衡好其中的关系，是一大挑战。

针对此类情况，华文教师不断创新课堂形式，将学生被动式的学习转化为主动式的参与。在内容上，引入剪纸、书法、京剧等，学生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形式上，注重运用新的教学方式，比如引入科技教学手段，运用新型教学资源，举办中文朗诵比赛、中文作文大赛等，让学生从中文学习中获得成就感，进而提升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正如相关专家所说，语言教学目标要从灌输和记忆转向学以致用、促进思考、促进语言创造性输出。

此外，有的华文教师并非科班出身，华文教学相关经验储备不足，会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希望未来会有面向海外华文教师的专业能力考核。同时，希望提供更多的培训，促进华文教师间的交流，提升大家的教学能力。”庞鑫说。

## 研习交流之旅收获满满

“到北京参加研学，我感受到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来自新加坡的华文教师刘炯红说。

研习期间，学员们聆听了单霁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国立等名师大咖带来的讲座，为充实理论知识、了解当代中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建起了桥梁。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杜晓勤的讲座，令研讨班中的学员印象深刻。这场讲座以《唐诗经典作品文本细读和

诗学探微》为主题，分享了理解、讲授古诗和古文的方法。

张艳翻开自己上课时记录的笔记说：“在教授古诗词时，我们不仅要讲解其字面含义，还要讲述古诗词背后的故事。如果能将这种讲古诗的方法运用到教学过程中，我觉得我的教学能力会有大的提升。”

在英国学习教育和心理学的刘珈羽也对这场讲座给予好评。“我对文化传播非常感兴趣，在英国的杜伦中文学校已经任教3年。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我有实践，通过此次研学进一步补充了理论知识。”刘珈羽说，“听了杜老师的讲座，有一种融会贯通的感觉。”

来自德国波恩华侨中文学校的华文教师潘娜对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孟德宏的汉字讲解印象深刻。“孟老师给大家讲解汉字，不仅讲汉字的本意，还讲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同时拓展其他相关的汉字。我之前并不了解这种教学法，此次听了很受启发，这对自己的汉字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潘娜说。

来自日本的华文教师胡若雪是第二次参加北外的华文教师研习班。“如果说第一次是抱着看一看的态度，那这一次就是抱着必须来的决心。当看到北外发布培训课程表时，就被深深吸引。怎么能不来呢？亲和幽默的孟德宏老师关于汉字的讲解让我记忆犹新。他在今年研习班的讲座中，不仅带来了新的故事，还让一个个汉字鲜活起来，对我们的教学十分有启发。”胡若雪说。

## 担负传承中华文化使命

参加此次研习，庞鑫作为华文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被进一步激发出来。“我们看到中国蓬勃发展的景象，就有更强的自豪感开展华文教学，传播中华文化。”庞鑫说。

“开展华文教育，让学生对自己的身份有更深了解。”缅甸华师范学院幼稚园园长杨会雄提到，在幼稚园上学的华裔学生和国内学生用同样的教材，读到中国等词时，他们会思考自己从哪里来。

“华文教师肩负一种使命：通过华文教育让华人子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杨会雄说。

对华文教师的使命，参与研习的学员都有自己的理解，但开展华文教育是在更深层次上打通学生和祖（籍）国之间的文化路径，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实现文化共鸣是他们的共识。

孟涵想说：“中国的不少优秀作品是很好的教学资源，例如最近上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我的职责是为华裔学生提供一种‘文化预热’，这种预热并不仅是让他们看懂、读懂字幕里的每一个字，而是让他们在看到这些情节和故事时，能够收获和中国国内学生同样的情感体验。”

潘娜则被开设讲座的各位老师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那种热爱打动。她说：“老师们对工作的那种情怀让我很是感动，这也让作为华文教师的我对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对未来的华文教育发展，南楠坚定地说：“只要我们担负起自己的使命，我们的学生就能接续中华文化根脉，用美丽的中文讲述他们眼中的星辰大海！”



华文教师在中国画课堂上学画画。

受访者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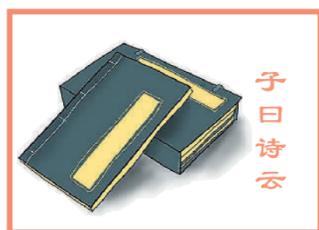
华文教师在长城上合影留念。

张子岳摄



华文教师在上太极课。

张子岳摄



子曰诗云

## 《贞观政要》：『贞观之治』是怎么来的

熊建

给皇帝进谏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哪怕皇帝欢迎臣下这样做。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待帝王，多是顺从而不敢违背，用甜言蜜语来博取帝王的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不得隐瞒己见，要依次说出我的过失。”

长孙无忌、唐俭等人深谙明哲保身之道，说：“陛下用圣德教化，使天下太平。在我们看来，您没有什么过失。”

可有位黄门侍郎刘洎不藏着掖着，径直答道：“陛下拨乱创业，确实功高万古，正如长孙无忌等人所说那样。但不久前有人上书进谏，遇到言辞内容不合您心意的，您就不依不饶，当面追根盘问，弄得上书言事之人无不羞惭而退。这恐怕不是鼓励进谏的办法吧？”

唐太宗听后说：“你说的这话很对啊，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改正错误。”

这个故事来自唐代古籍《贞观政要》，从中可以看出，李世民真心希望臣下对自己直言不讳，提意见、出主意，从而改进治理方式和策略。

后人总结“贞观之治”的经验，其中一条必然是唐太宗君臣之间坦诚相见，一方诚心进谏，一方虚心纳谏，从而产生治国理政的真知灼见。尤其是李世民和魏征之间发生的那些故事，国人耳熟能详。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些，要感谢《贞观政要》提供的文献资料。

作为一部政论性著作，《贞观政要》不长，全书10卷40篇，8万多字。作者吴兢，汴州浚仪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人。其为人，性格爽朗，正直不阿，勤奋好学，对经书和史学都有一定研究，特别是对历史学有较深的造诣。约在武周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前后，吴兢被召入史馆，与当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徐坚等人一同编纂史书，并成为亲密朋友。

武则天之后，吴兢看到朝政弊端丛生，矛盾重重，认为需要提醒继任者不要忘记祖先创业的艰难，尤其是唐太宗励精图治的作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因此搜集了唐太宗和45位大臣的主要言论，分门别类，按照时间先后排列成书，并于唐玄宗时期将书呈上。

从全书来看，多篇涉及君主政体、行政伦理、行政效率、行政编制、行政问责、行政监督、行政制衡等思想，譬如第一卷的《君道》《政体》，第二卷的《任贤》《纳谏》，第三卷的《君臣鉴戒》《择官》，第五卷的《仁义》《公平》《诚信》，第六卷的《俭约》《谦让》《奢纵》《贪鄙》，第八卷的《务农》《刑罚》等。这些行政思想的核心和要旨，集中在民本和仁政上。尤其前者，是“民为本”这一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延续。

作为封建君主中的开明者，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认识到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来自老百姓，民心向背才是王朝命运的决定性力量。这个理念是他通过纳谏得到不断加强的。

据《政体》篇记载，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魏征对唐太宗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这一关于君民关系的形象比喻给唐太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多次用这个道理来教训自己的子弟。有一次他看见太子承舟，就对太子说：“汝知舟乎？”太子回答：“不知。”唐太宗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

从这些鲜活的对话能看出《贞观政要》的行文特色——叙事简核，文笔洗练，材料多具故事性，言近旨远。虽然是十余年前的事，当今读者也容易懂。

由于吴兢编书的着眼点在于以史为鉴，“义在惩劝”，因此，对史事的编年问题未作过细的推敲，错漏之处不少。同时，由于历代辗转抄写，堆积了大量讹误。元朝儒臣直道，对《贞观政要》作过一次细致的整理，并加以注释。他的本子比较完整，流传最广。

书成后，《贞观政要》被列为皇子皇孙的必读书。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奉为经典，反复阅读。宋仁宗赵祯非常欣赏唐太宗任人以“德行学业为本”。元朝皇帝多次提起该书，并请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穆宗时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外，每天中午都请人讲授《贞观政要》。明宪宗朱见深还为之作序，推崇有加。清代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约在9世纪前后，《贞观政要》传到了日本。他们模仿中国也把《贞观政要》定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材。镰仓时代，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此书。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17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

虽然吴兢编书的直接目的没有实现——唐玄宗时期发生了“安史之乱”，唐代自此走了下坡路——但给后世、给世界留下了一部珍贵的文献。